

# 社會福利與平等：跨國指標的分析

蔡明璋

「成長」與「平等」已成爲當代追求國家發展的政治精點所致力企尋的兩個重要目標，但這兩個目標自有其不同的深層涵義，同時也隱藏了特有的意識型態，影響所及的社會政策執行的方向及實際做法乃因而成爲社會學家所感興趣的研究課題。強調「經濟成長」的政策，可能採取不同的資本累積

和方法，例如資本主義模式的巴西或社會主義的古巴，其明顯的目的則爲產生整體社會的經濟剩餘，以期能藉此提昇公民的普遍生活水準。另一種「平等」的政策取向則將經濟發展的目的側重在「分配」的層面上，對支持平等模式的政治精英而言，累積的過程並不佔有太重要的政策意義，在理想上，他們認爲純粹的經濟累積可能成爲最後階層不平等的因素，因而「成長」乃成爲一種「迷思」，但在仔細審視這兩種發展模式的社會——經濟過程時，似乎這一「對立的」概念在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可以做截然的劃分，「資本累積」雖是指涉整體的社會，但累積的結果也可能從社會的部分或階層的觀點去觀察，即側重在分配和取得的最後結果：是否各階層能够很公平的共同享有累積的剩餘，經濟分配的過度不均常是致使社會秩序不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成長與平等兩種發展的意識型態落實在實際政

策上，如何達成一種「平衡的」狀態，乃成爲理論家與政策執行者所迫切解決的問題。

本文的立場是將成長和平等視爲一種過程，而非兩種不同的發展的意識型態，或是可以獨立考慮的一組相對分相對分析概念，在累積過程完成之後（或同時），分配和平等化的趨勢也已開始在社會階層中運作了。以往有關的理論指出，社會及政治結構及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模式是導致社會分配公平的重要原因。以這些理論爲基礎，我們同時找出一些適合的，具理論意義的國家指標，建構出一個因果分析模型，並使用統計方法檢證理論的解釋力。透過理論建構和嚴謹的分析，我們的目的了解整個世界性的平等化型態，以及評價社會福利在經濟平等化過程中所占有的地位和角色。

## 一、理論背景的解析

在論及經濟的不平等時，一個重要的指標是階層的收入分配，一般經濟學家在解析個人的收入來源時，常將個人的總收入再加以細分成兩類，即實際工資所得和資本收入（Capital Income）。但這種區分常忽略了現代社會中另一種重要的經濟轉移。在福利制度相當普遍的現代社會中，來自政府共

公財的投資，無形中增加個人實質所得的非家庭轉移（Non-family Transfers），政府的社會安全計畫所給予個人的種種便利（如醫療服務、社區發展等），實際上減少了個人可能不必要的花費，而具有經濟剩餘再分配的效果。社會福利計畫之所以具有這種再分配的效果的另一個原因是，政府社會安全支出部分爲依賴人口所取得，老人和兒童不參與勞動也能有基本上的經濟安全，另外殘障、退休或失業者也同在社會安全計畫的照顧之內。因而社會福利的一個明顯的政策目的是社會的再分配及階層間收入的平等（Cutright 1967a, Lutz and Lux, 1982）。

但並非每一個社會均有相同的社會福利發展模式，我們也必須了解那些結構性的社會組織模式在背後推動整個社會福利的發展。基本上，社會安全計畫是一種社會投資，此種投資必須有大量國家剩餘的支持，愈是富裕的社會，愈有能力將社會安全計畫納入常規性的行政過程裏，而貧窮國家的社會安全計畫常只是紙上作業，所涵蓋的範圍也非常有限，顯然是受制於經濟匱乏（Wilensky and Lobeaux, 1965；Wilensky 1975；Cutright, 1965）。經濟累積除了透過福利計畫的支持而產生

再分配的效果外，它本身也可以是影響經濟平等的直接因素。根據 Lenski (1966) 的說法，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程度影響了社會的分配體系模式，在低度工業化的社會，由於技術層次較低，經濟生產力相當有限，在此種物質剩餘不多的社會，精英份子常控制社會分配的機制，結構性的不分配因而相當嚴重。而在技術較為進步，經濟生產力較高的社會裏，有較多的剩餘可以分配給較低階層，但精英份子所得到的「絕對量」仍然有增無減，而就整個社會的分配而言，則較以前平等。

純粹以經濟因素去解釋福利制度的發展並不為學者所贊同（詹火生，一九八二），國家的政治結構及公民的知識水準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經濟低度發展或社會剩餘極少的社會裏，政治或社會組織的模式可能會維持或增強現有的不平等分配，但當社會經濟資源較多時，政治精英能够分出一些剩餘，以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能够提高，而這種政治妥協的目的則為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以利經濟生產的持續，並使現有的社會階層結構不致有重大的改變（Rimlinger, 1966；Higgins, 1980；Taylor-Gooby, 1981；Pemberton, 1983）。除了政治精英的主動讓步之外，政治組織體系的變遷也同樣能影響福利制度的發展，政治民主化和憲政化的趨勢有助於一般人民取得同等於政治精英的政治權位，至少能以合法化的過程及選票去影響政治精英的社會政策，並要求政治精英以社會安全及普遍福利換取其政權的合法性，這種政治協議過程間接也減低了階層間的經濟不平等（Cutright, 1967b；Jackman, 1975）。

福利發展本身也是一種意識型態的結果，西歐福利國家所特有的福利意識影響了其國內的福利發展模式，而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或共產國家截然不同，並直接提高了其福利經費的支出（蔡明璋，一九八四a）。此種福利意識的激發常需要對福利和經濟發展表面上的「辯證過程」有較深入的了解。一般的看法以為福利是一種社會消耗，而不能辨認其所附帶的社會投資的價值，對福利制度的平等化作用也欠缺了解，因而極力反對者多是既得利益團體。在理論上，一個社會普遍的教育水準若是較高，應能使大眾對福利的再分配功能有較多的認識，並加以肯定與支持。再者，人民教育水準愈高，對政治運作過程也愈了解，對政府的社會政策也可能有較多的涉入，在這個意義下，會要求政治精英將國家的剩餘資源有效的再分配到各階層中。另外，教育水準的普遍提高，同時也意謂了個人的生產技術相差不會過度鉅大，至少階層之間的大力資本投資額會較為平等，進入勞力市場後所佔據的職位及所得收入也不會有太多的差別。普遍的提昇社會的教育水準，也同時是在促進社會經濟平等的一個有效方法。

## 二、指標的測量方法及說明

根據前文的理論探討，我們設計出一個因果模型（見下節圖一），並選擇以往學者所設計的相關

指標（符合理論意義的指標），作為理論概念運作化後的變項。

### 1. 依變項：經濟平等

「經濟平等」這個概念包含的範圍相當廣闊，在實際分析時，我們以「收入平等」來指涉這一現象的核心特質應無多大問題，因為收入一直是社會階層理論最關心的，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也是評價「平等」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由於我們相當重視階層間的平等，因此以階層所得分配作為測量指標應最合適。Taylor & Hudson (1975) 曾設計了一項指標，代表階層間收入平等的程度，他們認為理想上，若將社會區分為上下兩個收入階層，則每一階層所得的收入應該相等；但事實上，常是較少的一些人得到較多的收入，他們的指標即在指明有多少人得到社會的一半財富，若是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愈少，則社會的經濟愈不平等；若愈多（最多為五〇%），則愈趨近平等。

### 2. 中介變項：福利支出

來自政府社會安全計畫的非家庭轉移，是促使收入階層平等的一個重要因素。這項指標我們使用 Wilensky (1975) 的現成資料，以社會安全的「全部支出」（包括了各國法定的社會保險支出、家庭津貼、就業、公共衛生等）對國民生產毛額的比率（百分比）作為該國社會福利支出高低的指標。這些項指標的一個特殊意義是測量各國對福利發展所做的努力，福利經費愈多，至少證明該國有心提昇

全體人民的社會安全，由此也可了解政府所付出的公共投資的多寡可能因此種非文字轉移而促成的經濟平等的效果。

### 3. 自變項：

本研究的自變項包括經濟成長、政治民主、教育機會。

(1) 經濟成長是以國民生產毛額（以美元計）作為該國的經濟成長指標。Cutright (1965) 以「能源消耗量」作為該國發展的指標，與理論上的意義不甚切合。我們選用的指標直接和該國的整體經濟生產力有關，理論上應較接近「經濟成長」的實質意涵。

(2) 政治民主的程度則借用 Cutright (1970) 所設計的「政治發展指標」其給分的程序分為兩個步驟：a. 立法部門的分數和 b. 行政部門的分數，若一個國家有國會，且少數派占國會席次百分之三十以上者給二分，若未超過百分之三十者給一分，若無國會也無反對黨，則在立法部門的民主程度上得零分。行政部分的給分方式是，若國家的總統或總理職位的取得需要競選及人民投票決定者給一分，若無此程序者則為零分，Cutright 蒐集資料的時間是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六一年，這二十二年間若在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的政治民主程度均得滿分，則最高可達到六十六分。仔細推敲 Cutright 的指標涵義，似乎不能視為「政治發展」的指標，一些很重要的因素，如政治（選舉）參與程度，權力位置的開放性，政治精英的責任倫理，公民文化等（

Almond and Verba, 1963; Neuberger, 1967) 都未能納入考慮。因此，在運用這項指標時，我們應將其指涉的政治現象作較為清楚的界定與澄清。就給分的程序所顯示的意義而論，用「政治民主」來表達這項指標應較適合，Cutright (1970) 自己也強調這項指標是指涉立法部門的制衡力量及行政首長選舉過程中所反映出來的「大眾政治權力」。

(3) 教育機會的測量則以在二十一—二十四歲人口中，曾在大學登記註冊的人口占這個年齡層的百分比為指標。Wilensky (1975) 選用大學生做為分析的基礎，是因為在理論上，教育機會的多寡不應只侷限於初中或高中教育，中學教育常只作為取得「職業技能」或一般性的普遍基礎知識的正式訓練過程，而對於個人的了解政治運作意識型態的培養，並不比大學教育來得有效。大學程度以上的人口愈多，對政府福利政策的支持也應較為明顯而有力。

有關指標的年代大約在一九六六年前後（大超過四年），但基本上我們假設在短短的二、三年間各項指標所指涉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不致有遽烈的變遷，因而作為同時性的分析應不會產生太大的誤差。

## 三、統計分析的結果與解釋

各變項之間的因果過程我們以路徑分析來解說

，另外，我們也計算出自變項（外衍變項）對依變項的直接、間接效果，以比較各個因素的作用對收入平等的純淨效果。

我們發現各項指標間的零序相關係數頗高（表1），顯示這些現象彼此之間不是獨立的，所指涉的各種現象之關聯性並不會太低。值得注意的是，福利支出和其他變項的相關都達到顯著水準，而收入平等和其他自變項的相關也很高，平均在.5以上，但和政治民主的相關則低而不顯著（ $P > .05$ ），由於零序相關係數並未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所以和依變項之間的高相關可能是虛假效應所致，只能顯現一個粗略的關係狀況，並不適合作為理論因果關係的驗證數據。

圖一是我們根據因果關係所做的一個路徑分析模型，由兩組結構方程式所組成各變項之間的路徑係數是經過統計控制後的純淨效果，我們將以之作為假設檢證的基礎。

在理論上，我們認為福利支出及社會安全計畫需要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大量國家剩餘的支持，亦即經濟發展程度愈高，福利支出也愈多。在圖一我們發現，經濟成長確實能支持較多的福利支出，而且此一效果相當明顯（ $\beta = .631$ ）。生產技術的落後和生產量的不足，導致貧窮國家財政稅收無法有效的增加，在福利計畫及經費的支出上也因而捉襟見肘，國家經濟的「低度發展」連帶的影響到社會福利的「低度發展」（註一）。臺灣這方面的經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也就是在民國六十年後臺灣經濟開始「起飛」時，福利支出才相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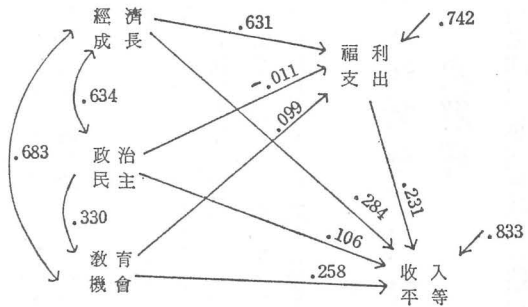
表一：本文主要變項的相關係數、平均數和標準差

	經濟成長	政治民主	教育機會	福利支出	收入平等	平均數	標準差
經濟成長	(64)	(51)	(62)	(64)	(40)	887.141	801.683
政治民主	.634**	(51)	(50)	(51)	(35)	53.333	8.489
教育機會	.683**	.330*	(62)	(62)	(40)	8.161	7.380
福利支出	.691**	.421**	.526**	(64)	(40)	7.706	5.902
收入平等	.552**	.256	.538**	.518**	(40)	33.358	8.685

\* $P < .01$       \*\* $P < .001$

( ) 內為樣本 (國家) 數。

增加。  
但政治民主對福利支出的純淨效果却顯得非常低 ( $-.011$ )，顯然原來的高相關係數 ( $\alpha = .421$ ,  $P < .001$ ) 是虛假效應。這種結果說明了政治民主可能只是指涉政治組織的原則和過程，對於福利政策的執行而言，只是一種「輸入」，但並無法保證政治「輸出」就能有利於人民福利的提昇。政治民主的特徵也只是將統治權力賦予政治精英，但一般公民並無法有效的影響這些政治精英的政治責任和倫理，因而民主並不一定能保證社會福利的制度化和，其最重要的癥結可能就是社會政策的支持與決定權並不在一般人民手上，而是在政治精英的決策



圖一：社會福利與平等的因果模型

偏好結果，民主的政治結構並起不了些微的作用，反而呈現負的關係。

教育的影響也不如我們理論假設的那麼明顯，路徑係數只有  $.099$ ，但它和福利支出的零序相關也是很高 ( $\alpha = .538$ ,  $P < .001$ )，和政治民主的表現模式非常接近，經過統計控制之後，與福利支出的關係就消失了。顯示我們在理論上的假設並未受到支持，可能的原因是 1. 教育在做為福利發展的意識型態支持上，並不是很重要的，普遍較高的知識水準，並無助於社會福利的直接發展。2. 大學教育的內涵相當分歧，也可能形成不同的職業利益團體，如受社會工作教育者可能接受福利制度，但醫師公會可能反對國家管理醫療制度。在相互抗衡，沒有「福利共識」的狀況下，高級教育機會的多寡遂因而未能顯示出提昇福利發展的明顯效果。

這三個變項對福利支出的解釋力相當的高。有四五%的變異量被這三個自變項所解釋 (註二)，已幾近一半。雖然我們未進一步對這些變異量進行分解，但似乎這些已解釋的變異量中有大部分是來自經濟成長這個因素，亦即經濟成長對福利支出最具解釋力。但殘餘變項的影響，仍相當大 (.742) (註三)。

理論上，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大量剩餘，也能使得較多的低階層者得到較多的收入，提高其生活水準。統計分析結果也顯示，經濟成長愈高，收入也愈平等，純淨效果為  $.284$ ，但這項統計結果的推論只是「空間性」的，亦即是經濟發展較低的國家與發展較高國家的比較；而非「時間性」的歷史

推論，我們很難說在現有的世界體系結構之下，一旦低度發展國家的經濟成長提昇到某一程度（接近已發展國家時），其收入分配不均的現象也會有同樣的舒緩作用。低度發展國家所扮演的經濟角色，及在世界體系裏的結構位置，常導致其國內經濟部門間的不均發展，影響所及的階層收入分配不均現象在這種狀況之下，也很難有平等化的趨勢，甚至是愈來愈不均（Wilber & Weaver, 1973）。

而政治民主程度愈高，收入不均等的現象却越嚴重，但這項效果並不明顯。政治民主所意含的權力分配的民主模式，常只涉及到政治精英的交替循環或流動，但並不一定保證支持民主的政治精英會將較多的經濟剩餘給予大眾分享。即使大眾透過選舉和政治參與要求權力機會的開放，常不能同時保證經濟機會的同樣開放，亦即經濟資源的平等分配和政治權力結構的開放之間並不是有明顯的因果關連。易言之，爭取政治民主的大眾常不是要求較多經濟機會的同一團體，當政治權力開放的目的達成之後，並不意謂經濟階層的同時改變，而只是政治階層中的上層精英之間的循環而已。

通常，教育機會的均等，使社會各階層間的人力資本或生產技術之差距不致太大，在個人進入勞力市場後，並不會過度集中在非技術職業或次級勞力市場之內（Reith et al. 1973），這使得收入的分配不會呈過度的偏態。本文資料的發現亦是如此，教育機會的提高確實具有減低收入不平等的效用，而其路徑係數只比經濟發展略低（.258），這個

發現很值得重視。一般而言，平等的社會分配是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但減低不平等的方法常必須有較大的社會體系改變，甚至是遽然的革命性變遷，例如從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變換成社會主義模式，這常須付出很大的社會代價（柏格，一九八一）。提高教育水準應是較不必須付出那麼大的代價，就能促進較平等的經濟分配，在比較各種可行或已使用過的方法後，教育是較為輕易而實際可行的辦法，而且各國大都已有一套強迫性的初級教育制度，只要再將此種教育制度進一步擴大，應能有有效的影響收入階層的分配，而趨向平等化的社會。

福利轉移雖然是一項很重要的社會再分配制度，但我們的統計分析顯示，其效用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大，從各自變項的純淨影響效果的比較而言，福利支出並不是最大的（.231），低於經濟成長和教育機會的效果，但仍具有一些正面的影響力。這個發現也很值得再深思。從表一我們發現，各國平均的福利支出相當低，只占國民生產毛額的七·七一%，但各國的差距並不會太小，兩個標準差已接近二〇%的國民生產毛額量。若福利支出確有再分配效果，零序相關頗高（ $X = .518$ ,  $P < .001$ ）則應是一個基本的證據，但當控制其他變項後，福利支出的純淨效果降低了許多。可能的原因是因為經濟成長和福利支出的零序相關相當高，兩者有大部分的效果重疊在一起，而使得兩者的路徑係數均偏低。其實教育機會也有相似的狀況發生，另一個原因是我們使用的福利支出指標是整體性的資料，無法區分出較細部的福利轉移，及個人可因

而得利的「公共財」，因而這項指標未很明顯的顯示出在各個國家中，平均個人能得到多少實質的福利轉移，在這種測量不夠明確的狀況下，福利支出對減低收入不平等的效果就無法很有力的顯示出來。

再就整個結構方程式的解釋力而言，收入平等已解釋的變異量有三〇·六%（註四），和福利支出的解釋量比較起來，顯然低了不少，殘餘變項的路徑係數也相對的變大（.833）（註五）。我們在理論上所做的假設並不是很有力的被實徵資料所支持，一方面是福利支出的指標不夠明確，另一方面也顯示現有理論之解釋力仍然相當薄弱。

前文的統計資料分析側重在各自變項的直接純淨效果，只就各變項之間的效果作一對一的說明，無法以整體的觀點去分析整個因果模型的連續性過程。表二列出了各自變項的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和總效果，我們將重點放在福利支出的中介效果上，以比較各自變項透過它而影響收入平等的效果大小。由於福利支出並無間接效果（在圖一的模式設定上是如此），我們在此不加以討論。

我們發現，經濟成長透過福利支出而影響收入平等的效果是最大的（.146），而政治民主和教育機會的間接效果則很低，分別只有-.003和-.023，這顯示了一個重要意義：社會福利制度引入現代社會生活中，藉著社會公共財轉移作用，而具有的再分配效果，必須要有較大量的國家剩餘支持才能完成預期的功能。福利支出對收入平等的直接效果雖然不小（.231），大於經濟成長的間接效果，



表二：各自變項的路徑係數效果分析

	自變項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福利支出	經濟成長	.631		.631
	政治民主	-.011		-.011
	教育機會	.099		.099
收入平等	經濟成長	.281	.146	.427
	政治民主	-.106	-.003	-.109
	教育機會	.258	.023	.281
	福利支出	.231		.231

但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經濟剩餘分配本身就是一種超乎制度化的力量，而非福利制度可以比擬的。低度發展國家福利支出普遍的偏低（蔡明璋，一九八四）也須對此負部分責任。

再比較各自變項對收入平等的總效果，經濟成長最大，然後依次是教育機會、福利支出、政治民

主，經濟成長對收入平等的效力是教育支出的一·五倍，是福利支出的一·八倍。從這裏我們得到的一個結論是，不論人民福利的水準或是經濟（收入）公平的程度，都是經濟高度發展國家優於低度發展的國家。這個現象並不被其他的社會、政治結構特質所影響，至少就我們考慮的因素範圍內確是如此表現出來。

#### 四、討論與結論

從各國的國家指標所做的統計分析後，我們得到如下的結論：

1. 影響福利支出的最有力因素，乃是取決於國家的經濟生產結構是否能提供大量的財政剩餘，以支持社會福利計畫的投資，而政治民主程度和教育機會的開放與否對福利發展並未具有顯著的影響。
2. 雖然福利制度藉著公共財轉移的手段，多少有助於社會經濟（收入）分配的平等，但這個效果並不是強而有力，反而是經濟成長本身所產生的剩餘，非但支持了社會福利計畫，同時也使得產生的大量剩餘能夠「直接的」再分配到社會的各階層中。另外教育對收入平等的貢獻也不可忽視，這主要是各階層間的人力資本及生產技術較為平均的緣故。
3. 經濟成長支持福利計畫，再導致收入分配的平均也是相當有效的制度化力量，這一個過程在經濟高度發展的社會尤其明顯，在經濟低度發展的國家，則較難達到這個效果，主要的原因是福利制度的發展受制於生產力量的不足和財政稅收的短缺。

由於我們使用的資料略嫌過時，常無法把握最

近的福利和平等的關係趨勢，但就筆者所能蒐集到的資料而言，已是相當新的了（註六），但我們並未將這些資料所展現出來的事實做「未來式的」推論，而是較保守的侷限在那個時代，因而在解釋上應不會有太大的問題。這方面的研究急需有較新、較完整、測量較精細的指標，作為理論驗證的基礎。當然，理論建構也是必須的，本文發現現有的相關理論解釋力並不是很強，一方面是缺乏有系統的跨國研究，另一方面由於所指涉的樣本是國家，各國特殊歷史經驗的影響常無法很完整的納入理論分析架構內，這也是未來跨國分析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本文作者為臺大社會學碩士）

附註：

1. 參照 Wilensky (1975) Gackman (1975, 1974), Cutright (1965)。但這種經濟成長和福利支出的正相關趨勢，就世界性的整體關係模式而言是正確的，但筆者的另一項研究顯示，在「富裕國家」的情況就有所不同，其關係模式是負面的，經濟成長愈高，則國家的福利支出愈少，這主要是受到西歐福利國家的特殊福利發展模式影響所致（蔡明璋，一九八四）。

二、這是已矯正過的數值，未矯正的解釋變異量為 .483,  $F=14.35$ ,  $P<.001$ 。

三、殘餘變項的路徑係數以矯正後的解釋量計算而得。

四、這也是矯正過後的數值，未矯正的解釋變異量為 .387。

五、同註四。

K. Cutright (1965, 1967a, b) Wilensky (1975) 的資料都是一九六六年或以前。Gackman (1974, 1975) 的資料更舊，時間爲一九六〇年。

參考資料：

柏格 (Peter, Berger) (1981) …發展理論的省——第三世界發展的困境，臺北：远流。

詹火生 (一九八二) …「社會福利理論之研究」，

社會建設四六號，頁三一—三三。

蔡明璋 (一九八四) …「經濟成長，政治民主與福利發展」，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第六期。

Almond, G. A. and S.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utright, P.

1965 "Political Struc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 537-550.

1967a "Income Distribu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46: 180-190.

1967b "Inequality: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 562-578.

1970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Gayd Ness (ed),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Reader, pp. 105-124.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Higgins, J.

1980 "Social Control Theories of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9: 1-23.

Jackman, R.

1974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29-45.

1975 Politics and Social Equal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Lenski, G.

1966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Lutz, M. A. and K. Lux (蔡明璋譯)

1982 「現代福利國家分析……人文主義的觀點」，社會建設四八號，頁九—二一。

Neubauer, D. E.

1967 "Some Conditions of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 1002-1009.

Pemberton, A.

1983 "Marxism and Social Policy: A Critique of the Contradictions of Welfar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2: 289-308.

Reih, H., D. M. Gordon, R. C. Edwards  
1973 "A Theory of Labor Market Stra-

t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359-365.

Rimlinger, G. V.

1966 "Welfare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 556-571.

Taylor, C. L. and M. C. Hudson

1975 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Taylor-Gooby, P.

1981 "The State, Class Ideology and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0: 433-452.

Wilber, C. and J. Weaver

1979 "Patterns of Dependenc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History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 Wilber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pp. 114-129. New York: Random House.

Wilensky, H. L.

1975 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lensky, H. L. and D. Debeaux  
1965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